



世纪文库

中国民族的形成

李济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国民族的形成

李济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次人类学的探索/李济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
ISBN 978-7-208-07769-0

I. 中… II. 李… III. 中华民族-民族形成-研究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1212 号

责任编辑 毛志辉
特约编辑 虞信棠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次人类学的探索
李济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5.25
插页 4
字数 203,000
版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769-0 / K · 1431
定价 28.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英光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韩卫东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中国民族的形成

——一次人类学的探索

本书出版说明

本书原是李济先生于 1920 年至 1923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期间用英文撰写的博士论文。1922 年，李济先生携论文初稿及介绍论文的报告——《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参加美国人类学年会，引起学术界关注。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对论文深加赞许，认为“从中看到许多有启发的见解”，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国问题》（*Probleme of China*）一书中作了大段引用。1925 年，论文初稿的第二章由雷宝华据打字稿译成中文，以《中国人种之构成》为题，发表于《科学》（月刊）第 9 卷第 11 期；1926 年，李济先生完成对全部文稿的修订；1928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部正式出版，书名为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1943 年，日本学者须山卓将其译成日文，以《支那民族の形成》的书名由东京生活社出版。1992 年，李济先生哲嗣李光谟及胡鸿保、张海洋等合作，将书译成中文，并做了大量审订工作；考虑到学术界多年的沿用和著者本人的称法，书名今译为《中国民族的形成》。中译本于 1996 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出版。

为纪念李济先生诞辰 110 周年，李济先生学生张光直、哲嗣李光谟将李济先生的全部论著编集为五卷本《李济文集》（是书收入《李济文集》第一卷），于 2001 年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 年，《李济文集》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为满足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需要，征得李光谟先生的同意，现将是书从《李济文集》中辑出，列入“世纪人文系列·世纪文库”，并按单行要求，对全书作了再次审校和必要的技术处理；李光谟先生也拨冗再次作了通读、校订。对此，予以说明。

译者的话

应编者之邀我们合作翻译了《中国民族的形成》一书。译毕后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应向读者作些说明：

(1) 本书原名为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今译为《中国民族的形成》，是考虑到学术界多年的沿用和著者本人的称法。但译者注意到就内容而论，若将其译成《中国汉人的形成》则会使名实之间更加相符。读者在看到书里的“中国人”一词时，应将其理解为“汉人”，即著者所说的“我群”。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族的交往和混血以及汉族“滚雪球式”的壮大都是无可辩驳的史实。著者虽未使用“国族”(Nation)一词，但他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多元一体”的进程。因此，“我群”与“你群”之分并无丝毫偏见或大民族主义。

(2) 本书所引汉文古籍主要是出自《二十四史》及《古今图书集成》，引者当初译成英文时在一些地方作了意译。这次我们翻译时基本都查核了原文，并依中华书局标点本及中华书局 1934 年影印本作了还原。由于本书写作年代较早，其中一些提法与当今研究结论明显不同处，我们以译者注的方式随文作了说明。另外还想在此指出两点：第一，鲜卑与匈奴、契丹、蒙古等族属东胡族系，而满族等则属通古斯；书中(尤其是表 76)提到的通古斯大多数应是指鲜卑族。第二，苗和瑶两族的语言现归在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而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书中提到孟—高棉族人在华中和华南的迁徙(如第六章)指的实际是苗族和瑶族先民的活动。

(3) 本书译事具体分工如下：张海洋译前言、第一章、第八章；李

苏幸译第二章、第三章、附录；林宗锦译第四章；林春译第五章；胡鸿保译第六章；颜宜葳译第七章。全部译稿由张海洋校对后又由胡鸿保进行了统稿，最后由李光谟先生终审。

(4) 翻译中曾得到张公瑾、龚佩华、邱久荣、定宜庄和邓小南等师友的具体指点，并参考了雷宝华选译的第二章及须山卓氏的日译本*，特此申谢。

因原著内容涉及的学科面广，加之译事仓促，故虽经努力，恐仍不免疏漏，请识者指正。

张海洋 胡鸿保

1992年5月于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 本篇英文初稿的第二章曾由雷宝华氏据打字稿译出，题名为《中国人种之构成》，见载于《科学》杂志第9卷第11期(1925年)。日译本题名为《支那民族の形成》，须山卓译，东京生活社(1943年)。——译者注

前 言

在写作本书时，我尽量结合了动物学和遗传学的方法。目前，透彻研究这一问题的事实材料还很不够；然而，通过利用历史学和人体测量学这两个方面的资料和数据，人们有了看待这一问题的新眼光并找到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它并不仅仅是试图在几乎完全依赖过去的记载的中国老派史家的方法，与通常过分简单地看待这一问题的西方人类学家的方法之间做出折衷。这种研究方法还被用于清除一直横在中国史学家和西方人类学家面前的许多不必要的困难。例如，我们不再有必要去寻找一个作为一成不变的体质单位的中国人的类型，或者去发明种种貌似可行的理论来说明中国人的起源。我在第一章里已相当明确地阐明了这一问题的性质。在此，我还要向我的许多朋友和老师表示我的谢意，他们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曾给我以帮助。罗兰·B狄克森教授通读了全书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E.A虎藤教授也是如此。对他们两人，我要表示特别的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既如良师，又似益友；没有他们的引导和鼓励，此书难得有现在的形式。我的朋友毕拉亚·古哈博士是此书手稿一丝不苟的批评家，他的批评导致我改写了许多部分。我愿将对他的感谢铭记于此。在坎布里奇和国内，还有很多朋友以各种形式帮过我的忙，我要对他们所有的人表示谢意。还应该特别提到毕士博先生*，他对此书的出版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使我能够从某些工作的压力下解脱出来，以修订这份两年多前即已完成，但因未经修订而迟迟不能付梓的文稿。

李 济

1926年2月于北京

* 毕士博(C.W.Bishop)是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派驻中国的专员；他当时正和李济共同筹划山西的考古发掘。——编者

目录

译者的话 / 1

前言 / 1

第一章 难题所在 / 1

第二章 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特征 / 5

一、数据及其来源 / 6

二、对数据的分析性考虑 / 35

三、对数据的综合性考虑 / 49

第三章 我群的演进：以城址衡量其规模 / 59

一、引言 / 59

二、总体分析 / 61

三、分省研究 / 74

第四章 我群的演进：在研究姓氏来源的基础上对我群构成变化的评价 / 106

一、材料来源 / 108

二、姓氏的数量与其增长 / 109

三、考查的十个姓氏 / 114

四、关于迁徙的总体方向的最终研究 / 146

五、从种族角度看姓氏的分布 / 149

第五章 我群的迁徙：一千五百年间的中国人口统计 / 151

第六章 南方的你群 / 159

一、早期的南蛮 / 160

二、盘瓠部落的故事 / 163

三、民族关系的诸种形式 / 167

四、族属的分类及族群的迁移 / 172

第七章 公元 1644 年以前的三次北方大入侵 / 180

一、三次大入侵的时间与范围 / 182

二、三次大入侵的民族志后果 / 184

第八章 现代中国人的整合 / 190

附录 / 201

图版及说明 / 202

第一章

难题所在

历代以来，中国史的研究都仅仅是从一个角度进行。但自从东方学派在欧洲兴起后，一种不同的角度得到采纳，并由此而出现了不同的视野。这两种立场相互之间是全新的——其间诚然并无公开冲突，但确如两极一般天差地远。全面权衡之下，优势似乎落在东方学家一边，原因全在于他们除了对中国历史的知悉之外，还对其本国的历史有所了解。相形之下，中国的史学家迄今为止很少能超越中央王国的界限。受到对其他文明中心的无知之限，中国的史学家有着与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的人性上的弱点，将自己的国家视为世界的中心，而把外国人视为野蛮人，仅仅在他们同中国发生某种关联时才对他们产生兴趣。一旦理解了这种观点，全部的中国历史便显得易于领会，甚至欧洲人亦可读懂。当然，东方学家们也多少被中国史学家们这种似乎无端的臆断所激怒，从而发展出一种看待中国人的固定观点：“他们全无历史意识，他们一成不变，他们的文化在一个静止不动的水准上停留了四千年之久。”等等。

显而易见，上述两种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不是它们在事实上搞乱某些人类学问题之嫌的话，我们本来不必考虑它们。例如，

说中国人一成不变达数千年之久，便会直接抹杀有关现代中国人的体质构成以及与他们在其相当久长的存在过程中的人种变化有关的全部问题。这可能有助于简化科学家的任务，但肯定无助于逼近问题的答案。公正地讲，现代中国人的形成不能仅仅因其显而易见的体质上的同一性而作为皮毛小事不予考虑。从体质上讲，他们并不像初看之下那样纯一，他们的民族志更是充满起伏跌宕。这一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个极大的人类学问题，并且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即使我们仅仅着眼于所知较多的那一部分，那也是一个至少长达两千六百年的过程。李雅各(James Legge)在其翻译的《诗经》序言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即我们所谓的中国本部，包括了 18 个省份，大体上可以说是坐落于北纬 20 到 40 度、东经 100 到 121 度之间，所占面积约达 1 300 000 平方英里。周代的中国位于北纬 33 到 38 度、东经 106 到 119 度之间，其中所包括的经度约为现在的三分之二，而在现今的 20 个纬度当中，周代领土所及不过 5 个。”^[1]

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现今所有生活在北纬 20 到 40 度、东经 100 到 121 度之间的居民，都是 2 600 年前占据着北纬 33 到 38 度、东经 106 到 119 度之间领土的人们的后裔吗？肯定的答案总是与下面这类不确不实的表述大同小异：“现今的中国人就是他们四千、三千或两千年前的祖先们的模样。”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我在这里所建议承担的任务，就充其量也不过是从一种增倍繁育的简单生物学现象中来辨认现代中国人的形成过程。现代中国人的形成这一问题，也就不外乎是其生活早被《诗经》时代的诗人所吟咏过的那些中国人的形成的问题了。然而，我认定这不是真实的。中国人远远不是在四千、三千或两千年里一成不变的。哪怕在一千甚至在五百年里也不是没有变化的。在其扩展的过程中，他们一直在征服、被征服和再征服，使自己适应新环境并重塑其文化，所到之处，他们都吸收了新的血液。因此，关于中国

[1] 《中国经籍》第四卷，第一编，第 127 页。

人的形成，是存在着真正的问题的。在这一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像许多人所做的那样探讨中国人的起源是毫无用处的。

这样做之所以无用，不仅仅因为它本末倒置，还因为除了有关地理分布之外，根本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何谓中国人。人们不能靠对其姓名的词源由来的研究来界定他们，因为照一位在这方面花费过大量时间的著作家的说法：“词源学研究仅仅是第二或第三手的科学研究”^[1]，况且其价值充其量也总不过是语言学上的。为妥善研究这一问题，对中国人的体质特征的考察看来是唯一合理的出发点。为了确立一个关于中国人的体质状态的坚实概念，必须对中国人的头形、中国人的身体、中国人的手和中国人的脚加以研究。没有一个坚实的关于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的概念，就很难看出我们怎样才能研究他们的起源。

但是，出发点毕竟只是个出发点：它帮助我们建立起中国人的类型以及他们与其他人种的联系，仅此而已。它只能定义静态的人。对于活生生的人，人的动态方面，则只能通过生物学之外的办法，或许可以称之为民族学的方法来加以研究。其实名称倒无关紧要。让我们看看它能做些什么。

如同前面业已指出的，中国的史学家总是把他们的国家看成是世界的文化中心。但他们也意识到了周边其他人类的存在。从中国历史的开端时起，他们的头脑中就有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志概念。一个，在这里借用萨姆纳先生的贴切措词，可以称为“我群”，即被中国的史学家们视为同类的文明人的群体。而他们所谓的野蛮人，在我们看来便可以称作“你群”^[2]。在此必须强调的是，这两类群体之间的分野并非总是政治的分界。毫无疑问，在很多情况下政治疆界有助于廓清我

[1] 这里指的是伯索德·劳佛尔发表在“中国之得名”专栏上的一篇文章，见《通报》第8卷，第725页。关于这一名词的词源的最近一次讨论，是在劳佛尔与伯希和之间进行的。伯希和的文章见于《法兰西远东学院集刊》1904年第4期，第143—150页。这两篇文章还对先前关于这一有趣问题的讨论做了总结。

[2] 然而，萨姆纳先生认为“你群”这一概念是专用于原始社会的。见萨姆纳：《民俗论》1911年版，第12页。

群的边界，但因所处的场所不同，它也并不总是如此强大的同化力量。几个特点鲜明的族群共处于持续变化着的中国版图之上的情况，是任何一个研读中国历史的人所熟知的。即便是现在，也还有至少五个不同的族群共处于中华民国的旗帜之下。

因此，这样的群体划分完全是民族志意义上的。在中国史学家们的观念中，有些民族志方面的特质总是与我群相联系的。任何具有这些特质的人，无论其体征如何，无论是黑发人还是红发人，都被划入我群；而没有这些特质的，便是属于你群的野蛮人了。

然而，尽管中国人有保守观念，与我群相关的民族志特质也远非在任何时候都一成不变。例如，把诗经时期的中国人的行为与他们在唐代的后裔相比，再与人们在十九世纪末所观察到的蓄辫子的男人和缠足的女人相比，其间的巨大鸿沟肯定需要许多年才能跨越；而且，以他们不断变化的眼光来研究这些变化着的民族特征，对于解释现代中国人的形成过程都是有用的线索。

即使把我们的研究空间限定在本部 18 省之内，把时间限定在《诗经》时代与明朝灭亡(公元 1644 年)之间，我们给自己设定的任务也还是大得惊人，但这任务也不是没指望完成的，因为我们不必同时研究问题的方方面面。我主张以我在前面已经解释过的中国人的两个带根本性的历史概念为基础，破解这一难题。一方面，我们占有与历史上的我群在其扩展过程中的演进有关的全部传奇与经历的材料；另一方面，有着与这一扩展平行展开的你群在这些限度之内的演进的材料。

在此，问题的几个突出的方面会立即显现出来。我群在其扩展过程中经过了哪些路线？哪些是历史上的你群的特征？你群与我群有过哪些关系——他们是被消灭了，被同化了，还是仅仅被驱赶到了南方？我在此提议加以研究的问题的所有这些方面，都多少有些新颖；而且我认为只有这样去研究，我们才能富有成果地得到一些其起源引起过如此多讨论的，有关中国人原生类型的真正知识。